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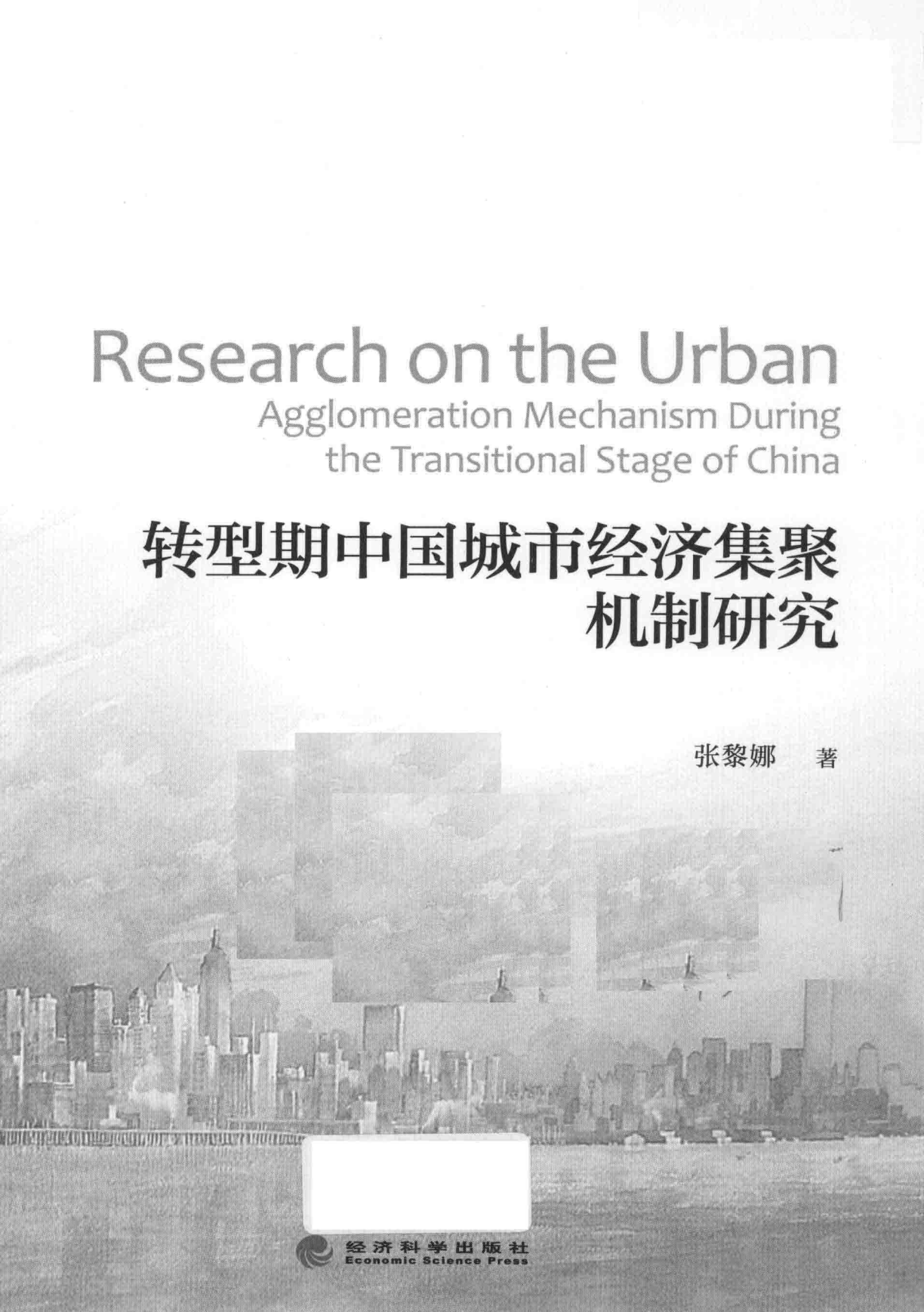
Research o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f China

转型期中国城市经济集聚 机制研究

张黎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Research o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f China

转型期中国城市经济集聚 机制研究

张黎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期中国城市经济集聚机制研究 / 张黎娜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41 - 5479 - 5

I. ①转… II. ①张… III. ①经济转型期 - 城市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9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2318 号

责任编辑: 齐伟娜 易 莉

责任校对: 杨 海

技术编辑: 李 鹏

转型期中国城市经济集聚机制研究

张黎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bs. tmall. com](http://jjkx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0. 75 印张 170000 字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479 - 5 定价: 28.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1978年,我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为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随后,城市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不断探索和逐步完成,城市对外开放范围的逐步扩大和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更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经济步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①为例,2000年时其市辖区GDP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为26.02%,到2011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32.68%,也就是说将近1/3的GDP集聚于这35个大中城市。这些大中城市集聚着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究其原因,大量的经济资源向城市集聚,中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处于不同时期的城市,驱动经济集聚的机制是否会有所不同?分别又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城市经济集聚机制作用的发挥?诸多思考皆围绕本书核心问题即何为中国城市经济集聚的动力机制展开。

本书以“中国城市经济集聚的动力机制”为研究对象,在统一的D-S研究框架下,对土地财政、农民工供给变化、服务业发展、技术外溢四种城市经济集聚机制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之后运用数值模拟、基于35个大中城市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量回归等多种方法对理论结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

第一,从35个大中城市内部来看,地方财政收入的集聚度最

^① 35个大中城市依次为:北京、长春、长沙、成都、大连、福州、广州、贵阳、哈尔滨、海口、杭州、合肥、呼和浩特、济南、昆明、兰州、南昌、南京、南宁、宁波、青岛、上海、深圳、沈阳、石家庄、太原、天津、乌鲁木齐、武汉、西安、西宁、厦门、银川、郑州、重庆。

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最为平均;大多数经济资源在35个大中城市间的分布趋于集中,而投资的分布则是趋于分散,这由经济结构转变所致,35个大中城市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逐渐下降。从35个大中城市的区域集聚力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力在不断增强,而西部落后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力则在减弱。从35个大中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35个大中城市的经济权重不断提高,尤其是外资的使用几乎占全国的100%。简而言之,从全国来看,经济资源在向城市集聚,从35个大中城市内部来看,经济资源又向发达的大城市集聚。

第二,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居民消费多样性偏好度、贸易成本,以及城市拥挤成本是影响城市经济集聚的基本因子,城市的集聚力与居民工业品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份额、消费者产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正相关,与公共品边际成本的增速、贸易自由度负相关。

第三,土地财政现阶段对中国城市经济集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推动作用要求土地财政的规模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即若以城市集聚力最大化为标准,则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土地财政规模,这一最优土地财政规模的具体位置取决于其他一系列的经济条件。具体来讲,最优土地财政规模与消费者工业品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住房边际成本增速、贸易成本,以及土地财政的使用效率正相关,与工业品消费替代弹性负相关。

第四,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在中国城市经济集聚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问题,即“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我国现正处于“刘易斯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间,农业剩余劳动较充裕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集聚力逐渐凸显。“刘易斯拐点”将会影响到城市的集聚水平,当农业剩余劳动供给区域不平衡时,剩余劳动富余地区的城市有较强的集聚力。农业剩余劳动供给完全弹性、农业剩余劳动供给区域不平衡和农业剩余劳动城乡联动三种条件下城市集聚力的比较表明,农业剩余劳动供给区域不平衡条件下更容易形成大城市,城乡一体化,即农业剩余劳动工资与城市居民工资联动是城市集聚的一个阻碍因素,不利于城市的集聚。

第五,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集聚的作用机制与工业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它更多依赖于本地居民对服务业多样性和多层次的需求的增长,只有当本区域居民的收入跨过一定的门槛,服务业对城市经济集聚才会发挥

推动作用。具体来讲，居民消费结构、公共服务业效率、居民收入水平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如果以提高城市集聚水平为目的，则不能盲目地鼓励服务业发展，否则会适得其反。在三种条件下鼓励服务业发展会提高城市的集聚力，分别是：较高的服务品消费比重，服务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较高的居民收入水平。

第六，城市经济集聚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集聚，“技术溢出”分为“全局溢出”和“局部溢出”两种，其中“局部溢出”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是通过降低本区域“相对价格”水平和提高“相对工资”水平两种“极化效应”实现的。居民消费结构、全局人口规模、企业固定成本以及工业品消费替代弹性是影响“技术局部溢出”效应的四个因素，其中居民工业品支出份额、系统总人口与“技术局部溢出”效应正相关，企业固定成本、工业品消费替代弹性与“技术局部溢出”效应负相关。由于居民工业品支出份额和工业品消费替代弹性本身对城市集聚有直接的作用，因而这两个因素对城市集聚的影响具有“叠加效应”。“技术全局溢出”对各个区域的影响是对称的，因此“技术全局溢出”水平的高低对城市集聚的相对规模没有影响，但“技术全局溢出”会产生更高的生产率，会引致更高的居民实际收入，因此会提高全体居民的福利。

目 录

第1章 导论 / 1

-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1
- 1.2 相关概念的述评和比较 / 7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2
- 1.4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14

第2章 中国35个大中城市集聚现状分析 / 16

- 2.1 35个大中城市集聚与分布分析 / 17
- 2.2 35个大中城市区域集聚度分析 / 38
- 2.3 35个大中城市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集聚地位分析 / 43
- 2.4 本章小结 / 45

第3章 城市经济集聚的土地财政作用机制 / 47

- 3.1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 47
- 3.2 最优土地财政模型 / 50
- 3.3 35个大中城市经验分析 / 63

3.4 本章小结 / 65

第4章 城市经济集聚的农民工供给机制 / 68

4.1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 68

4.2 城市经济集聚的农民工供给机制模型建构 / 72

4.3 一些经验证据 / 89

4.4 本章小结 / 93

第5章 城市经济集聚的服务业提升机制 / 95

5.1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 95

5.2 城市经济集聚的服务业提升机制模型构建 / 97

5.3 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门限分析 / 115

5.4 本章小结 / 120

第6章 城市经济集聚的技术外溢机制 / 123

6.1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 123

6.2 城市经济集聚的技术外溢机制模型构建 / 127

6.3 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分析 / 139

6.4 本章小结 / 144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147

7.1 结论 / 147

7.2 政策建议 / 149

参考文献 / 152

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经济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和发展契机，诸多因素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集聚现象的衍生与变化。城市的发展伴随着高房价、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然而经济活动依旧会在城市集聚，城市的经济活动密集区域仍然会有较高的生产力。经济活动空间上的集聚性、经济活动外部效应的广泛性，以及产业结构的非农性和多样性业已成为城市的显著特征。步入 21 世纪，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显突出，城市经济集聚在不断加强，以 35 个大中城市为例，其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份额不断提高，见图 1.1。

图 1.1 显示了 2000 年以来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经济权重的变化趋势。2000 年，35 个大中城市 GDP 占全国的比重为 26.02%，到 2011 年这一比重上升到 32.68%，从拟合的指数曲线看，35 个大中城市经济权重大约年增 1.7% 左右。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新的城市涌现，中小城市也日渐扩大，在此背景下 35 个大中城市的经济比重依然在上升，这表明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城市集聚，尤其是大中城市集聚增强。伴随着中国大中城市的集聚过程，又呈现出诸多新的现象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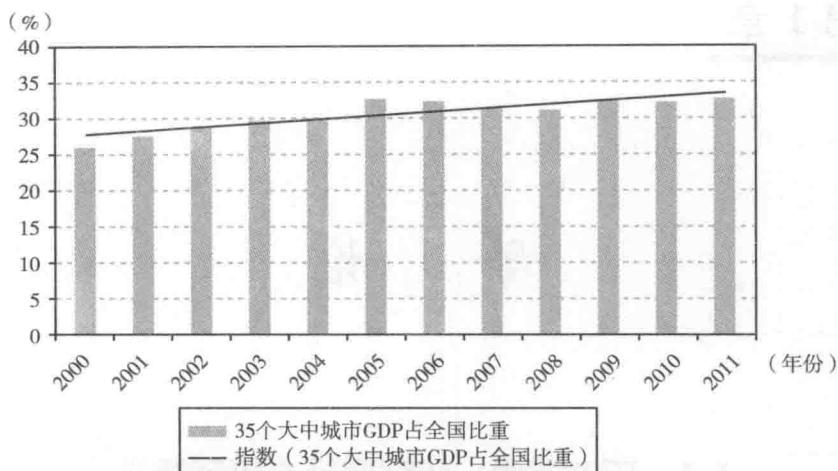


图 1.1 35 个大中城市经济集聚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 2001 ~ 201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第一，土地财政问题。中国住房制度在上世纪末最终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利分房制度逐步取消。接踵而至的是商品房市场的极速发展，而与此相伴的则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极度膨胀，2000 年 35 个大中城市的土地出让金为 3 299.36 亿元，与当年 35 个大中城市预算内一般财政收入的比值为 0.14:1，2011 年 35 个大中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增加到 16 233.39 亿元，与当年 35 个大中城市预算内一般财政收入的比值为 0.85:1，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大中城市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图 1.2 反映了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土地财政的发展趋势。从图 1.2 可以看出，35 个大中城市的土地财政收入呈指数增长，从拟合的指数曲线看，拟合优度非常高，指数曲线为 $y = 440e^{0.308x}$ ，也就是说 35 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年均递增 30% 左右。庞大的土地财政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助推房价疯涨，非法圈地占地，耕地流失，财政风险等。土地财政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责难，诸多学者对此也持批判态度。现在看来，如何给处于困境中的土地财政寻求生存之路业已刻不容缓，解决土地财政的办法大致有两个：一是取消土地财政，但这与地方政府的意见相背并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因此几乎不可能；二是进行税制创新，将土地财政从预算外纳入预算内，这一方案沿袭了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

且在当下中国具有可行性。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土地财政依靠出让大量土地获取收入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现实情况下，房地产交易会长期存在，并且土地具有保值增值的特性。因此，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出让陆续退出，土地出让金的收入逐渐减少，预算内土地财政主要来自房地产使用和交易税。考虑到未来土地财政的常态化，土地财政的制度化也应及早提上日程，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对居民征收房地产税，将所得税用作城市公共建设，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城市，从而持续推动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图 1.2 2000~2011 年 35 个大中城市土地财政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土地出让金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预算内一般财政收入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第二，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种特殊概念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泛指那些户籍登记在农村，虽然拥有承包经营的土地，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却与土地分离，并主要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大批劳动力涌入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扩大，持续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进程。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流动性强，他们其中一部分是在农闲时节外出务工，另一部分则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农民工为城市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促进了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他们是城市化的直接动

力，是城市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是城市第三产业的一支主要力量。近些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政府的重视使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有所提高，然而相对于贡献度而言，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与他们的所得收入相比仍存在差距。农民工对我国非农经济产业的贡献率平均为 16.37%，对中国经济做出重要的贡献，城镇职工对非农经济产业的贡献是农民工的 1.63 倍，然而城镇职工收入水平是农民工收入的 3.43 倍^①。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等统计规定，只要在城镇居住六个月以上（含六个月）的人口即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然而，广大的农民工虽然成为了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却因为没有具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无法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也使我国的城市化成了质量不高的城市化，对我国扩大内需和长期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表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经济均衡增长，并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高服务业比重和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第三，城市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倾向。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会最终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并且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显示，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多集聚于国际化的大城市（Daniels, 1995；James, 2008）。面对产业演进的世界趋势，以及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战略目标，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发展方针，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然而，我国经济发展区域间十分不平衡，北京、上海等地区已与发达国家相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还比较落后，在此种经济背景下对服务业实施“一刀切”的鼓励政策势必会阻碍经济发展。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鼓励服务业发展？换言之，怎样条件下鼓励服务发展才能一方面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另

^① 转引自王春超、荆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与收益分享》，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年第 2 期。

一方面又提升城市的发展水平,带动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四,城市集聚中的知识和技术外溢问题。技术与知识的外溢是以人力资本为媒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20世纪末,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已下降到22.21%,初等教育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97.8%,远远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49.2%的水平。文化教育水平是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在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早就摆脱了“人海战术”,不再单纯依靠人口数量取胜,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资本的较量,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逐渐提升,人力资本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受教育人口占了八成,城市、镇、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由高到低呈现出梯度变化。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来自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地方政府谋求城市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的必经之路。人力资本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其自身独特的形成机理,比如人力资本载体的易流动性,人力资本集聚的规模效益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地域偏差。因此,如何扩大区域内人力资本间的知识外溢,是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增强城市集聚力的有效途径,同时,降低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壁垒,推动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本供求间的匹配优度,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推动经济系统整体效率的提高。

1.1.2 研究目标

本书的总目标是探求转型期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机制及其作用的外在条件和基础,所谓“集聚经济机制”其实就是推动城市集聚经济的“动力系统”,即存在着哪些力量且以何种方式推动这种经济现象的形成。本书的研究立足于城市集聚经济理论模型,多方位考察经济现象及其与现实因素的内在关系,致力于从理论上揭示城市集聚经济现象背后一般性的、共同的内在经济规律或作用机制。在此总目标下,本书将其分解为四个子目标:

第一，研究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力图解释各地方政府通过运作房地产的方式来推动城市发展的经济合理性，以及土地财政应用的边界，即最优土地财政问题。

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对中国城市经济集聚的推动机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后，在中国称为“农民工”，众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得到的是比农业剩余略高的收入，过的是“候鸟式”的生活，那么这种特殊的劳动如何对中国城市集聚产生影响，以及它的作用机制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是本书的第二个子目标。

第三，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产业结构演化的普遍规律是服务业最终会取代制造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也要求在城市中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取代是有一定条件的，尤其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更是需要具体的研究服务业推动城市经济集聚的作用机制。研究服务业影响城市集聚的机制是什么，怎样的条件下服务业的发展才会推动城市集聚，这是本书的第三个子目标。

第四，技术外溢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规模经济是城市集聚的重要原因，技术在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外溢则是规模经济的一个内在机制，技术外溢又分为局部技术外溢和全局技术外溢，不同的外溢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同时技术外溢程度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技术外溢机制，以及相关变量对外溢本身的影响机制是本书的第四个子目标。

1.1.3 研究意义

对城市经济集聚机制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尤其是能够针对中国城市集聚特有的现象建立理论，予以解释，在实践上对中国的城市经济建设亦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讲，本书对中国城市集聚机制的研究有以下意义：

第一，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影响机制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深入理解土地财政推动城市集聚的原理，从而把握土地财政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促进城市集聚，在政策上就可以控制好度的问题，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影响土地财政的作用大小，对这些因素及其作用方向的研究，将最大限度地

发挥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即农民工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特有的问题,我国存在农民工的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工一方面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对城市管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因而深刻理解农民工对城市集聚的作用机理,适时地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体系,从而最终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第三,服务业最终取代工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也是现代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服务业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理必然与工业的集聚机理有所不同,因此深入研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把握好工业主导的城市向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升级的条件和时机,才能避免产业结构升级的盲目性,将城市发展引领至一个正确的轨道。

第四,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是城市经济集聚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集聚的结果,即技术外溢能够推动城市集聚,城市集聚又能够产生技术外溢,他们互为因果。本书对城市集聚机制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把握技术外溢的条件、范围与程度,从而更好地利用区域内的技术外溢,提高本区域的技术水平,提升城市整体的经济效率,增强城市集聚力,更好发挥城市对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

最后,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经济集聚现状的全面分析,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目前城市集聚的发展趋势与空间分布,对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更深入的理解。城市集聚空间分布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从城市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从而为较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提供一个城市视角的政策方向。

1.2 相关概念的述评和比较

城市经济集聚,亦称城市集聚,出现在英文文献中为“urban agglomeration”,是指经济系统中的人口、资本、技术、产品等生产要素、消费品,以及生产和消费活动向城市的集中,本书中“城市经济集聚”与“城市集聚”这两个术语会替换使用。本书研究的是城市经济集聚机制,与其

最相关的是集聚经济理论，相近的还有集聚效应、产业集聚、城市化等研究，因此需要对此进行回顾和比较，从而使本研究的范畴更加清晰化。

1.2.1 集聚经济

集聚 (agglomeration) 是指经济活动的集中，它由某种循环逻辑创造并维持，集聚经济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是指因企业间或各种生产活动的选址彼此靠近而使成本降低所产生的正的外部效应。较早关注集聚现象的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研究更多的是限于集聚效应，即集聚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马歇尔 (Marshall, 1890) 则深入探讨了集聚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劳动力池、投入共享与知识外溢三种解释。韦伯 (Weber, 1909) 第一个提出“集聚力”的概念，他的理论成为现代集聚经济理论的基石。韦伯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集聚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形成的节约。可见，韦伯的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有关，他强调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受韦伯 (1909) 理论的影响，克里斯托勒 (Christaller, 1933) 提出了“中心理论”，开创性地将服务业纳入分析范畴，在均质地表假设的分析框架下，较早得出了城市群落，即城市等级分布的结论。随后对集聚经济的研究逐步深化和广化，包括胡佛 (Hoover, 1936) 对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的划分，伊萨德 (Isard, 1956) 对“反集聚经济”的研究，阿隆索 (Alonso, 1964) 对 CBD 开创性的研究，雅各布 (Jacobs, 1969) 等对城市知识外溢的研究，以及后来克鲁格曼 (Krugman, 1991) 等新经济地理的研究，等等。

1.2.2 集聚机制

作为一种外部性经济，集聚经济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人们之前不太重视研究集聚经济的原因与机制。但无论如何，许多空间研究者为了突破这一局限做出了宝贵尝试。集聚经济的来源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由马歇尔 (1920) 提出的三种集聚机制：劳动力市场共享、投入共享、知识溢出。杜兰登和普加 (Duranton and Puga, 2003) 认为马歇尔对集聚经济的划分作为实证研究来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作为理论机制来分析，并不是非

常有效。他们认为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基于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的微观基础。罗森莎和斯特兰奇 (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2) 认为集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产业、地理和时间。在每种情况下, 文献表明集聚经济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另外, 在集聚经济的来源方面, 还有自然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机会和寻租的证据, 也显示出对集聚有所贡献。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韦纳布尔斯 (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 在 *The Spatial Economy* 一书中从产业集群角度来研究集聚经济。此外, 在最近的空间经济研究中, 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 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对古典空间经济理论的突破, 代表人物有布莱恩·亚瑟 (W. Brian Arthur)、保罗·克鲁格曼等, 他们所研究的核心内容分别为收益递增、路径依赖 (Path-Dependence)、历史性特征、锁定效应 (Lock-In effect)、正反馈 (Positive Feedback) 效应和空间多重均衡等等。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集聚因素也有很大变化, 尤其是信息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有的集聚因素发生了重大改变, 也推动着集聚经济理论研究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空间集聚, 更注重集聚和网络的关系。除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外, 通过集聚之间的网络化, 能够创造出新的空间外部效应。目前, 作为空间外部经济的集聚经济在新经济 (New Economy) 的发展中正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

1.2.3 集聚效应

当前许多文献对集聚和收益递增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 没有明确区分城市集聚机制和城市集聚效应, 进而对城市集聚的源泉和发生机制产生了混淆, 对城市集聚经济的解释陷入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的困境 (Duranton and Puga, 2005; Glaeser and Gottlieb, 2009)。

城市集聚效应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或经济效果。从本质上看, 外部经济是城市经济系统“集聚效应”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或实现方式。但是, 笔者认为城市集聚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是一种全方位的外部经济效应, 集聚效应主要包括近邻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以及洼地效应。

成本外部性可以看作是集聚效应的具体体现。空间集聚条件下经济活动密度的提高和空间临近, 实现了生产和交易的规模经济, 同时促进知识